

記者心中的角色模範及其影響初探： 香港個案研究

王悅、李立峯*

投稿日期：102 年 7 月 2 日；通過日期：102 年 11 月 8 日。

* 王悅為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候選人，e-mail:
kenbess2000@gmail.com。

李立峯為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e-mail: francis_lee@cuhk.edu.hk。

《摘要》

借助職業社會學的角色模範 (role model) 概念，本文探索了優秀記者能否成為專業意識形態的載體從而影響其他新聞工作者。研究以香港為個案，用 2006 及 2011 年新聞記者調查數據考察了以上問題。結果發現，心中有角色模範的受訪者更相信新聞的社會影響力、更認同新聞的專業功能、政治觀念更自由。來自不同地方專業模範代表的理念和認知差異不大，但相對而言，來自中國大陸的理想記者在香港記者心中似乎更能代表新聞的倡議功能。研究顯示了角色模範概念適用於對新聞工作者的分析，初步驗證了此概念對新聞研究的重要性，並為未來的分析奠下基礎。

關鍵詞：角色模範、香港、專業主義、新聞工作者調查研究

壹、前言

每個社會的新聞業都有一批著名記者，他們或已名載史冊，或仍活躍於新聞前線。有些名記者因為負責某個新聞欄目或報導某次重大事件而廣被認知，他們那些得到社會認同的工作成就提高了新聞業的名望，甚至吸引著年輕人入行。另一方面，有些記者雖然鮮為一般市民所知，但他們在職業領域裡備受推崇，其事跡和聲望為年輕記者提供了豐富的學習和參考資源。不論是那種名記者，他們都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職業群體的代表，成就了不同人對記者的想像，為人們示範著記者的理想特質。

名記者的傳記或回憶錄往往是暢銷讀物，但新聞學研究甚少系統地考察某些記者會否影響其他新聞從業員的專業認知、自我意識等。換言之，在影響記者專業性的各種因素中，作為榜樣的個體很少作為影響因素進入實證研究視野。不過，在社會心理學和職業社會學，有關一個行業中的某些個體如何對該行業其他成員產生影響的研究則頗為豐富，其中「角色模範」（role model）是此類研究最常用的概念工具。

有關角色模範的研究嘗試解釋人們在專業社會化的過程中如何通過認同、觀察某些個體或與之比較來學習專業技能、形成自我意識、進行自我評估，甚或通過仿效這些個體來達成職業目標和自我實現（Bakken, 2005; Cheung & Yue, 2003; Essers, Weel-Baumgarten, & Bolhuis, 2012; Lockwood & Kunda, 1997; May, 2009; Quimby & De Santis, 2006; Yue, Cheung, & Wong, 2010），有些研究更進一步探索角色模範在承載和傳遞專業傳統和文化認同等方面的作用（McAllister, Happell, & Bradshaw, 2010; McLean, 2004b）。

不難想像，不少新聞工作者也可能在心中懷有自己的專業角色模範。那麼，其他行業的研究發現是否也適用於新聞工作者？角色模範的存在會否影響記者們的專業觀念、對新聞行業和現象的判斷和認知甚至個人對社會及政治問題的看法？不同的角色模範又會否承載著或折射出具備不同意義的專業文化？

本文以香港新聞工作者為研究對象，以量化研究方式對這些問題作出探究。我們運用 2006 和 2011 年香港新聞工作者調查研究的數據，探討記者心目中的角色模範與他們自身的個人特徵、專業認知，以及政治態度等變項間的關係。

本研究的意義在於它從一個新的角度討論新聞工作者的專業理念和認知的構成及來源，並幫助我們了解個體認知如何與行業的意識形態相連接。本文希望可以為角色模範這概念對新聞專業研究的意義提供進一步討論的基礎，並對推進新聞專業教育提供新的視角和實證依據。

下文先討論記者的專業意理以及其他共同認知和態度跟個體典範間可能存在的關連，然後簡介社會心理學和職業社會學對角色模範的研究，其後會因應理論觀點和香港新聞業的場景特徵提出具體研究問題和假設。

貳、相關理論

一、新聞專業與著名記者

過去數十年的新聞學研究顯示，在特定社會的新聞工作者通常都會對自身行業的專業性有共同的理解。在一些社會和政治環境相對穩定而新聞業又發展得較完善的社會，記者很可能會對新聞的社會功能、記者

的社會責任以及專業操守和倫理等問題有普遍共識（McLeod & Hawley, 1964; Weaver & Wilhoit, 1996）。在一些經歷社會和政治轉型的不地方，不同新聞範式可能同時存在（Chan & Lee, 1991; Pan & Chan, 2003），所以專業記者在意識形態上也不一定是個單一群體，但縱使在轉型社會中，記者對自身專業的理解仍跟自己所屬的記者群體密不可分。

此外，新聞工作者的共同認知所涵蓋的內容比「專業性」所覆蓋的廣泛。在日常工作層次，由於記者們有共同或高度類似的工作經驗，他們往往會用同一視角看待他們接觸的人和社會與政治事務，而記者之間在前線或後台頻繁的交往互動亦會強化他們的共同觀點和視角。所以，Zelizer（1992, 1993）認為新聞工作者構成一個詮釋共同體（interpretive community），他們共同擁有的不只是專業判斷和理念，亦包括對周遭事物的理解和詮釋方法。

無論是專業理念抑或是對新聞中的人和物的詮釋，記者的共同認知和態度被很多因素和過程影響，包括新聞教育、機構內部的社會化，甚至傳播科技的轉變等，而跟本文旨趣較為相關的是重要新聞事件和人物的影響。

譬如 Schudson（1993）對水門事件作為美國社會集體回憶的研究論及該事件成為一個社會神話，將新聞界的聲望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樣的集體回憶本身就成為記者共同認知的一部分，而記者如何理解水門事件中新聞界的角色則對他們如何理解新聞專業有很大影響。

同樣地，Zelizer（1992, 1993）指出，媒體通過對一些有新聞記者深入參與的歷史事件敘述，建立起自己對社會事件定義的權威。這些敘事與自我表述成為新聞操作的範例，同時亦成為記者們討論、挑戰與改變新聞工作標準及界線的參考資源。換句話說，通過對關鍵事件（critical incident）的報導、回顧和討論，記者們對抽象原則的理解和

想像跟具體的新聞操作聯繫起來，並逐漸形成新聞群體理解自己、自己的工作以及社會環境的參考指標。

除了事件，優秀的個體記者也可作為抽象原則及新聞想像的具體示範。仍以水門事件為例，首先報導事件的《華盛頓郵報》記者 Bob Woodward 和 Carl Bernstein 的經歷被簡化成為個體記者抵抗強權、揭發真相的英雄神話，至今仍影響著人們對調查記者的想像（Schudson, 1993）。

也有研究討論，當一些著名記者去世時，他們被廣泛報導的生平事蹟往往凝聚著所謂的「新聞成就」（journalistic success），也成為新聞專業權威的現實註解（Carlson, 2007, p. 165）。當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名主播 Walter Cronkite 於 2009 年 6 月去世時，美國媒體中斷了日常報導，將這位（前）新聞記者的生平事蹟放上了新聞頭條。報導把 Cronkite 跟眾多美國歷史事件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如指在甘迺迪刺殺案發生時，Cronkite 報導甘迺迪死訊時落下的淚水是全美國人民的情感表述；而在越戰時期，Cronkite 與電視新聞把越戰帶進美國人的客廳，從而間接結束了該場戰爭（Carlson, 2011）。這種新聞界借助回顧名記者生平而進行的自我論述對新聞內部有整合作用，對外則提高了新聞的合法性（Berkowitz, 2000）。

由此可見，著名記者與 Zelizer 所說的關鍵事件一樣帶有新聞業用來建構自我理解和權威的資源。不過，可以成為行業的象徵資源的名記者不一定要在普羅大眾之間赫赫有名，在新聞業內部對同行們具有影響力的記者遠多於隨著關鍵事件高度曝光的名記者。畢竟，群體內部的成員在選擇專業偶像和參考對象時，手上掌握的資訊和所採納的標準很可能跟一般市民所擁有和採納的有所不同。

比如陸曄與潘忠黨（2002）的研究指出，在中國新聞轉型過程中，

記者在同行中的名望可以通過官方評獎等正式管道，也可以是通過「口碑」等非正式管道形成。因此，著名記者既可是官方樹立的行業榜樣，也可以是通行於娛樂和新聞之間的名人記者，還可以是突破體制而贏得同行敬佩的專業記者。

但無論是哪一類，新聞工作者對這些同行的認識都不一定要借助媒體報導，直接的工作關係、業內的口碑、專業教育的案例等都讓新聞工作者可以接觸或瞭解到一些可以作為自己學習和參考榜樣的行業優秀個體。

但當記者選擇以一位同行為榜樣或模範時，這模範會對其產生甚麼影響？在這裡我們就要借鑒社會心理學和職業社會學關於個體對他人影響模式的研究與發現。

二、角色模範與自我認知

很多職業研究（career studies）發現，不少人認為自己的職業選擇、專業道德以及事業成就都或多或少受到行業中的某些角色模範的影響。例如 Lent, Brown 與 Hackett（2000）在美國的研究發現，一個人心目中有沒有角色模範會影響其對職業的興趣、自我效能感和對事業的期望，而這些因素最終會影響到其職業成就。Hackett, Esposito 與 Halloran（1989）發現美國大學女生選擇甚麼人作為角色模範會影響她們對自我的評估、對事業的重視程度、希望達到的教育水平以及對非傳統職業的選擇。

另外，也有美國研究顯示醫學院學生認為角色模範是培養專業道德和倫理的最重要因素（Basco Jr., & Reigart, 2001; Byszewski, Hendelman, McGuinty, & Moineau, 2012）。一項針對澳洲精神科護理人員的調查則

顯示，角色模範是專業人員認識及瞭解其專業歷史的重要途徑（McAllister et al., 2010）。以上這些研究都指向同一基本陳述：角色模範的存在會對個人的職業發展和專業理念產生影響。

角色模範究竟通過甚麼機制對人產生影響？現有文獻主要有兩種解釋：第一種解釋來自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認為人們會觀察他人並將他人的行為特徵進行編碼，然後試圖在自己的行為中重複被編碼的特質（Bandura, 1977）。應用於角色模範對他人的影響這問題上，社會學習理論強調的是個人觀察角色模範的行為特徵並加以仿效；換句話說，該理論強調行為的模仿。

社會學習理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為甚麼在專業倫理、溝通技巧等方面，角色模範往往比正規的課堂教育對年輕人的專業化更有效。但一些學者則認為，將角色模範的影響歸結為行為模仿實忽略了觀察者與角色模範間的關係特性，也忽略了角色（role）的社會含義，因此行為模仿不是角色模範對他人產生影響的唯一機制（Gibson, 2004; Jung, 1986）。

第二種關於角色模範影響機制的解釋則強調自我觀念（self-concept）的形成和作用（Lockwood & Kunda, 1997）。自我觀念意指對自己的理解、定義和評估，它儲存著每個人的人生經驗、自我激勵的想法和各種行為動機（Cross & Markus, 1991; Whitbourne, 1985）。當一個人視另一人為角色模範時就會對角色模範產生認同，從而用角色模範所體現的特質來理解和評估自己，並產生相應的行為（Lockwood & Kunda, 1997）。

這有別於行為模仿，因為通過改變自我評估和理解而生產的行為並不一定是角色模範本身有直接展現過的。同時，強調自我觀念的形成和轉變的理論觀點容許角色模範對他人產生負面影響。事實上，雖然角色

模範在一般情況下都能激勵人們加倍努力提升自己，但角色模範有時候也使人沮喪自棄（Lockwood & Kunda, 1997）。

當然，以上兩種理論並不相互矛盾，人們可以在改變自我觀念的同時模仿角色模範的某些行為。另外，不少研究發現，人們往往與心中的角色模範在許多方面有相似性，如女性更傾向選擇女性角色模範、有色人種的角色模範更多是與自己同一種族的老師或上級。

Jung（1986）認為，角色模範是人們根據自己的需要和對自我的理解來選擇的榜樣，其特質更多是被個體用來強化自己的觀點和信念，並激勵自己進一步向目標邁進。所以，角色模範可以被理解為人們把自己建構的理想模型投射到現實存在的人物身上，觀察者根據自己的社會角色而注意到某些看來最能彰顯這個社會角色之理想特質的個體，並與之建立某種心理聯繫（psychological matching），一方面以其為標準來認識並衡量自己，另一方面則試圖通過仿效來令自己與其更加相似。

Gibson（2003, 2004）試圖整合以上理論觀點而提出了角色模範的幾個概念要素：首先，角色模範是主體的意識建構，指人們在某一時期、某種社會環境中根據自己的需要和已有的自我認知為自己建構出的一些理想自我（ideal selves）。第二，這些建構出來的理想自我被投射到某些具體人物上，人們跟這些人物可能有直接接觸（如同事、上級等），也可能只是通過媒體知道（如名人明星甚至是虛構的小說人物等）；第三，被視為模範的個體因為源於主體的意識建構和主動選擇，往往與主體具有相似性，而他們所代表的不是個人，而是一類社會角色，如某種專業的工作者。當然，被視為模範的人往往是該種社會角色中的佼佼者。第四，主體一旦確定了角色模範，便會通過仿效其行為、特質來增加自己與這個模範的相似性。

將以上論點放到新聞工作者身上，再結合之前有關新聞專業的討

論，我們可指出，當一位新聞工作者將某位同業視為自己的角色模範時，他是把自己心中的「理想記者」形象和特質投射至角色模範身上。不過，在一個社會雖有很多記者都可能被自己的同業視為模範，且每個新聞從業員選擇的角色模範可能不一樣，但是人們心中的「理想記者」形象和特質卻應有共通地方，這是因為一個社會中的新聞工作者會對新聞專業性有共同的理解。舉例來說，如果一個地方的新聞界非常強調第四權的實踐，那麼被新聞從業員視為模範的記者很可能就是一些出色的調查新聞記者。所以，一個社會可以有很多記者被別人視為角色模範，但他們很可能代表著類似的理想記者形象，而這理想記者形象在一般情況下都跟該社會已有的新聞專業主義相通。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個別新聞工作者心目中的模範可能代表著一些跟新聞專業理念無關的東西，角色模範也可能代表著某些對新聞社會角色的非主流看法，但整體而言，我們預期，角色模範所承載的「理想記者」形象會傾向鞏固及強化既有的新聞專業主義觀念。我們會在下一節將這論點變為一些更具體的研究假設。

叁、研究場景、問題和假設

雖然香港最早的報章可以追溯至 19 世紀，但今天佔主導地位的新聞媒體基本上都是 20 世紀下半葉的產物。¹不過，戰後早期的香港新聞媒介「本土」意識薄弱。由於香港在戰後主要是難民社會，普羅大眾與殖民地政府間有互不干涉的傾向（Lau, 1982），所以當時的香港報章亦較多關注兩岸間的政治問題及中國大陸的狀況，而對香港本地社會和政治事務並沒有深入的報導和探討（Chan & Lee, 1991）。直至 70 年代香港社會中本土意識的興起和香港人身份認同的確立（Ma, 1999），再加

上 70 年代尾開始的中英兩國對香港前途的談判，香港傳媒的本土意識和定位才開始增強。

而在這歷史轉折點和獨特的政治環境中，香港新聞工作者吸納了源自英美、建基於自由主義的新聞專業主義作為自己的合法性信條（*legitimizing creed*）。他們認為理想的新聞工作者應獨立在政治經濟權力之外，相信及時、準確地為公眾提供資訊是新聞最重要的社會功能。他們篤信客觀中立地報導新聞的重要性，也認為新聞媒介有責任代表大眾監督當權者（*Chan, Lee, & Lee, 1996*）。就算在回歸之後，縱使香港傳媒受到不少政治壓力，而新聞界亦出現自我審查，自由主義新聞觀仍被新聞工作者奉為圭臬（*Lee, 2007; So & Chan, 2007*）。

由於自由主義新聞觀在香港專業新聞工作者中仍佔主導地位，我們預期大多數香港記者心目中的角色模範也會承載著跟自由主義新聞觀有關的理念和態度。但值得一提的是，在選擇角色模範時，香港記者不一定會從香港傳媒內部尋找值得推崇和效法的榜樣，這是因為香港新聞社群不算大，而具強烈本土傾向的新聞媒體歷時亦較短，香港歷史上並沒有很多著名記者。

同時，香港記者可以從至少另外兩個地方找到跟他們息息相關的仿效對象。第一，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專業的新聞和傳播教育受英美的影響較深，很多在大學任教的新聞傳播學者都曾在英美唸書。以上因素再加上香港新聞界信奉的正是英美的自由主義新聞觀，所以不少香港記者很可能會視一些著名英美記者為角色模範。第二，香港始終是華人社會，無論從專業課程還是其他管道，香港記者對中國近代報業史也可能或多或少有所了解，他們對如張季鸞或范長江等中國近代著名「報人」不一定陌生。另外，在過去三十年間，大陸的改革開放造就了一批新的著名記者，香港記者也可能視他們為角色模範。

在以上背景下，本研究將從三個方面來探索新聞專業的角色模範對香港新聞工作者的影響。首先，我們希望瞭解香港記者心中的專業角色模範樣貌為何、有甚麼共同特質。所以本研究的第一個問題如下：

問題一：香港新聞工作者心目中的角色模範樣貌為何？這些角色模範有甚麼基本個人特徵？

其次，本研究將分析心中有角色模範的記者和心中沒有角色模範的記者，這兩類新聞工作者在基本個人特徵上是否有差異。更重要的是，兩類新聞工作者間會否在專業理念和其他跟新聞相關的態度和觀念上有差異。根據先前的文獻檢閱，我們認為心目中有角色模範的記者會比心目中沒有角色模範的記者更重視新聞媒介的專業功能、更認同新聞媒體對社會有很大的影響、政治理念上更傾向自由主義的價值觀。

心目中有角色模範的記者會更重視新聞媒體的專業功能是因為角色模範應是主流專業理念的載體，心目中有角色模範的記者對自己的專業理念有更具體的想像，亦應更重視這些專業理念。心目中有角色模範的記者會更認同新聞媒體對社會有影響，是因為不少人在選擇角色模範時會選擇行業中的成功個體，而對新聞行業而言，很多名記者或受同行欣賞的記者都是因為作品對社會產生影響而被視為成功。所以，心目中有角色模範的記者應該對新聞能對社會產生影響有更具體和深刻的認知。

此外，我們認為心目中有角色模範的香港記者會在政治理念上更傾向自由主義的價值觀，這是因為如前所述，香港新聞工作者大都接納自由主義新聞觀。如果一般角色模範承載的通常是該行業的主流觀念的話，那麼香港記者心目中的角色模範很可能大都有傾向自由主義的色彩。

綜上，我們可以提出問題二及三個研究假設：

問題二：心目中有角色模範的香港新聞工作者與心目中沒有角色模範的香港新聞工作者在基本個人特徵上有何不同？

假設一：心目中有角色模範的新聞工作者更重視新聞媒體的專業功能。

假設二：心目中有角色模範的新聞工作者更傾向認為新聞具有社會影響力。

假設三：心目中有角色模範的新聞工作者在政治取向上更傾向自由民主等價值。

以上研究問題和假設關注的是新聞工作者心中有沒有角色模範，而最後一組研究問題關注的是甚麼樣的記者會選擇甚麼樣的角色模範。我們在理論部份已經提到，過往研究顯示人們往往會選擇一些與自己相似的人作為角色模範，如男性傾向選擇男性角色模範，所以下述分析也會探討新聞工作者與自己心中的角色模範之間是否存在某些共性。

另外，我們之前提到香港新聞工作者的角色模範可能是本地記者，但也可能是西方或中國大陸的記者，這便衍生出一個問題，就是來自不同國家的角色模範會否承載著不同的專業理念。一方面，香港、美國和中國大陸的新聞業有其自己的歷史和傳統，如香港雖然深受英美新聞界的影響，但也具備一些非英美的新聞傳統。例如，《明報》創辦人查良鏞和《信報》創辦人林行止所代表的不是歐美的專業新聞，而更接近中國傳統中的所謂「文人辦報」模式。而中國大陸內部的新聞傳統則和香港及歐美的差異更大，所以來自三個地方的角色模範可能代表著不同的新聞理念。

但另一方面，按照之前理論部份提出的有關角色模範的主觀建構和選擇的觀點，我們預期縱使香港新聞工作者從中國大陸過去或現在的新聞界中選擇角色模範，他們仍然傾向選擇一些跟香港主流新聞專業理念

吻合的記者為模範。事實上，在香港社會及新聞界的知名大陸記者往往是那些在中國大陸新聞自由仍未得到保障情境下，勇敢地報導一些敏感和批判性話題而聞名的新聞從業員，如戴晴、劉賓雁、錢鋼、胡舒立等。對香港新聞工作者來說，這些大陸名記者代表的理念可能跟來自歐美的名記者大同小異。從這個角度看，來自不同地方的角色模範不會代表著截然不同的新聞理念。由於有兩種相反的可能性，我們只提出研究問題而非假設。

根據以上的討論，本文最後兩個研究問題是：

問題三：新聞工作者和他們心中的角色模範在人口特徵上有沒有基本共性？譬如男女新聞工作者是否更傾向選擇同一性別的角色模範？不同年齡層的新聞工作者是否選擇貼近自己年齡層的模範？

問題四：選擇來自香港、大陸和西方的記者作為角色模範的香港新聞工作者是否在專業理念、政治態度和對新聞影響力的評估有所差異？

肆、調查研究方法及變項的操作化

本研究的數據來自 2006 和 2011 年香港新聞工作者問卷調查，對象是所有香港主要報章以及電視電台的新聞及公共事務節目部門的新聞工作者，包括所有負責政治、經濟和社會新聞內容生產的從業員，但不包括體育及娛樂記者。²

兩次調查採取同樣的抽樣程序：研究隊伍先在每個傳媒機構找到一位或多位新聞工作者為「接洽點」幫助在其機構裡派發問卷。派發問卷

時以工作桌為單位，在每張工作桌上放置一份問卷，讓新聞工作者在空閒時間自己填寫。「接洽點」再幫忙收集填寫好的問卷，被訪者亦可把填好的問卷直接寄回研究隊伍所在的大學部門。2006 年的調查總共有 1,003 名被訪者，回應率為 55%；2011 年的調查有 926 名被訪者，回應率為 57%。

兩次調查問卷都包括一道開放式問題：「誰是你心目中的理想記者？」，我們將被訪者對這問題的答案視為他們心目中的角色模範。問卷用「理想記者」來提問主要是基於兩個考慮：首先，在香港人日常用語中並沒有角色模範這個詞，直接問被訪者心目中有沒有角色模範，被訪者可能感到混淆。

在日常用語中相近於角色模範的詞語有榜樣或偶像等，而榜樣比較接近角色模範的經典定義，它強調被觀察者作為觀察者的參照體，值得學習和模仿，但缺點在於該詞難以表達主體認知的選擇性和建構性。而偶像則更強調觀察者對被觀察者的全面接受和認同，以及兩者之間具有主觀的等級距離，這大約來自偶像原本的宗教崇拜意味，有浪漫化和絕對化的傾向。加上偶像一詞容易令人聯想到普及文化中的追星現象，令其意義偏離於角色模範。

而「理想」一詞意指對未來事務的美好想像、希望實現的奮鬥目標，又或是一種事物的完美狀態。我們相信，在香港的日常語境中，被訪者能直覺地了解「理想記者」的意思：「理想記者」代表一個參照體，作為受訪者個人在專業發展或職業生涯的一個學習、向上比較或奮鬥的目標。同時，「理想記者」亦代表著接近完美的，最符合「記者」這個抽象概念的現實人物；這些都對應著角色模範概念的含義。

並不是每位被訪者都有提出自己心中的理想記者，所以我們可以根據這題目而得出新聞工作者心中有或沒有角色模範。我們接著對被訪者

提出來的理想記者進行簡單的編碼，從而得出一些跟理想記者特徵相關的變項，如理想記者的性別、活躍年代以及跟研究問題四相關的角色模範來源地等。

至於跟研究假設一相關的「對新聞媒體專業功能的重視」變項，調查問卷有一組包含 18 條陳述的問題，每一條都指向一些新聞媒體的社會功能。問題要求被訪者用五點李克特量表來表示每個陳述表達的媒體功能重要性（1 代表非常不重要，5 代表非常重要）。這 18 條陳述的設計參考了 Weaver 與 Wilhoit（1986）對媒介社會功能的概念化。根據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結果（請見附錄）和陳述的概念內容，我們認為其中 13 條陳述可以用來代表 Weaver 與 Wilhoit（1986）指出的四個媒體功能，分別是信息發佈、解釋、倡導和對抗權威（adversarial）。每位被訪者對某個媒體功能的重視程度就是他們對屬於該媒體功能陳述回應的平均值，詳見表一：

表一：香港記者對新聞媒體專業功能的重視

功能	題目陳述	2006		2011	
		平均數	信度	平均數	信度
信息發佈	依據事實報導最近發生的事件				
	迅速地為大眾提供新的信息	4.27	.78	4.41	.76
	報導可靠信息以阻止流言的散播				
解釋	對形成中的政策展開討論				
	對政府的政策作出解釋	3.89	.78	3.99	.79
	幫助市民了解政府的政策				
倡導	幫助市民實行輿論監督				
	推動社會改革	3.61	.80	3.70	.80
	成為公眾的喉舌				
	聲援社會弱勢團體				
對抗權威	質疑並批評政府官員的言行				
	質疑並批評工商界的言行	3.72	.96	3.81	.97
	質疑並批評社會團體的言行				

對新聞媒體社會影響的認知則由三道題目測量，詢問被訪者認為新聞媒體對市民的政治態度、對政治人物的行為以及對政府政策的影響力有多大。被訪者以五點李克特量表來表達，答案 1 代表影響非常小，5 代表影響非常大（三道題目的平均值在 2006 年分別為 3.82、3.61 及 3.35，在 2011 的平均值分別為 3.75、3.77 及 3.43）。

對新聞工作者的政治態度，兩個年份的問卷都要求被訪者評估自己對香港民主化和平反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立場，被訪者以 1 至 10 分來表示答案，1 分代表非常不支持，10 分代表非常支持。在香港，所謂自由

主義 (liberal) 的政治傾向跟香港及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問題密不可分，所以我們用這兩道題目來代表被訪者的政治態度，而越高分就代表被訪者越具自由主義傾向 (支持香港民主化的平均數在 2006 與 2011 年分別為 6.83 及 7.62，支持平反六四的平均數在 2006 與 2011 年分別為 6.59 及 7.85)。

需要先在這裡說明的是，由於須要控制問卷的長度，所有被訪者均要回答一些較重要的問題 (如專業理念)，但一些次要題目 (如政治態度和媒介影響力認知) 則只有約一半被訪者需要回答 (兩種問卷是以系統抽樣的方式配的)，所以下統計分析的有效樣本會因應變項而有所不一。

伍、研究結果

一、香港新聞從業員心目中的理想記者

兩次調查中共有 423 位被訪者提名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記者，佔樣本數 21.9%。兩個年份中有提名理想記者的被訪者比例相若：2006 年為 21.7%，2011 年為 22.1%。至少曾被一位被訪者提名的理想記者共有 171 位，分別來自不同地區和歷史時期。回應研究問題一，表二列出了 16 位在兩年調查研究被提及最多次的新聞工作者，其中 6 位來自美國，3 位來自中國大陸，7 位來自香港本地。他們都被提名超過六次或以上，加總起來佔總提名數近一半 (45%)。

表二：被提名最多次的 16 位「理想記者」

理想記者	提名數			簡介
	2006	2011	合計	
1. Peter Jennings	13	6	19	前美國廣播公司【今晚國際新聞】（World News Tonight）首席主播，2005 因癌症去世。
2. Bob Woodward	10	8	18	美國著名調查記者，1972 年在《華盛頓郵報》任職時因報導水門事件而著名。
3. Mike Wallace	11	6	16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60 分鐘時事雜誌】創辦者之一及著名主播，採訪過中國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和江澤民，2011 年逝世。
4. 程翔	6	7	13	曾在香港《文匯報》工作的資深記者，2005 年在任職新加坡《海峽時報》駐中國首席特派員時因涉嫌間諜罪在廣州被捕，後於 2008 年獲假釋。
5. 伍晃榮	7	6	13	香港無線電視前體育新聞主播，擅以輕鬆手法報導體育賽事，深得觀眾愛戴，也影響了香港電視新聞界報導體育新聞的方式。
6. 梁家榮	1	11	12	前亞洲電視新聞及公共事務部高級副總裁，2011 年 9 月因亞視誤報江澤民死訊而辭職，後表示他曾力阻報導該條未經證實的新聞而不果。
7. 張季鸞	4	8	12	民國時期著名報人、政論家，在主持《大公報》期間事業達到頂峰。1941 年去世後同時獲得了國共兩黨的高度讚譽，提出四不原則，強調新聞的獨立性。
8. 林行止	7	4	11	《信報》創辦人，被視為香港戰後「文人辦報」傳統的代表之一，以寫社評專欄聞名。

理想記者	提名數			簡介
	2006	2011	合計	
9. 范長江	4	6	10	民國時期《大公報》著名通訊記者，後轉向共產黨陣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擔任《解放日報》社長、新聞總署副署長、《人民日報》社長、文革時期遭到監禁並受到迫害致死。
10. 張翠容	5	5	10	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及著名戰地女記者，被稱為行走第三世界和戰場的「香江第一戰地女英雄」。
11. 陸鏗	3	6	9	二戰期間任駐歐洲戰地記者，1949 年因辦《天地新聞》入獄。1957 年被打成右派入獄，1975 年獲釋。1978 年赴香港，與胡菊人創辦《百姓》雜誌。1985 年訪問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後被中共用為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的罪證之一。
12. Dan Rather	9	0	9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前晚間新聞主播，【60 分鐘時事雜誌】主持人，97 年曾現場報導香港回歸。
13. Edgar Snow	5	2	7	首位成功採訪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的西方記者。
14. 方東昇	3	3	6	無線電視新聞主播。
15. 方健儀	0	6	6	無線電視前首席記者兼主播，2012 年離開新聞界改任廉政公署高級新聞主任。
16. Edward Murrow	4	2	6	美國廣播新聞記者，因實地報導第二次世界大戰而聞名，並曾在五十年代於電視節目中批評其時掀起反共運動的參議員麥卡錫。

得到最多提名的前三位記者都來自美國，位居榜首的是前美國廣播公司晚間新聞首席主播 Peter Jennings，³ 共被提名 19 次。第二位是因報導水門事件而聞名的調查記者 Bob Woodward，共被提名 18 次，而第三位則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60 分鐘時事雜誌】節目創始人之一 Mike Wallace。

Jennings 於 2005 年 8 月因病逝世，消息也被香港媒體廣泛報導，到 2011 年，他的提名下降到 6 票。但這並不一定代表香港新聞工作者只是因應調查研究期間誰在新聞媒體有較多曝光而選擇理想記者，⁴ 事實上，所有表二中的歐美記者在 2011 年的得票都低於 2006 年。這似乎展示著一個更普遍的現象，就是香港記者越來越少以歐美記者為模範。

無論如何，Jennings 顯然得到不少香港記者認同。有論者形容，Jennings 的死伴隨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國家廣播公司（NBC）新聞主持人的更換，標誌着「偶像新聞主播時代的結束」（Johnson, 2005；引自 Greer, 2008）。Woodward 在 2006 和 2011 年的提名次數相若，他在水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已成為新聞神話，被簡化為記者不畏強權追求真相的經典代表（Schudson, 1993），而本研究顯示這新聞神話對美國以外的一些地區也可能有長遠影響。

至於香港記者對 Wallace 的認同也不難理解。首先，【60 分鐘時事雜誌】長期在香港電視台的英文頻道轉播。其次，Wallace 曾於 1986 年訪問中國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又於 2000 年訪問了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後一次訪問還被江澤民在 2001 年訓斥香港記者時提及。⁵

除了這三位，被提名六次或以上的美國記者還有前 CBS 晚間新聞主播，因報導甘迺迪刺殺案成名，並在 97 年曾到香港報導香港回歸的 Dan Rather，首位到延安採訪中共領導人，《西行漫記》以及《紅星照耀中國》的作者 Edgar Snow，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出色的戰地廣播新

聞記者並曾在 50 年代公開批評美國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的 Edward Murrow。

理想記者排行榜上並列第四位的是兩位香港新聞工作者，各被提名 13 次，分別是前任新加坡《海峽時報》駐中國記者程翔及香港無線電視前體育新聞主播伍晃榮，緊隨其後的是前任亞洲電視新聞及公共事務部高級副總裁梁家榮，被提名 12 次。程翔雖然任職新加坡媒體，但因為是香港人，曾在《文匯報》工作而被普遍認為是香港記者。程翔在 1989 年六四事件後離開當時任職的《文匯報》，後又於 2005 年在中國大陸因「間諜罪」被判入獄，但外界普遍相信他的入罪與他試圖取得一份趙紫陽生前訪談錄有關。

梁家榮是香港資深電視新聞記者及主播，2007 年起任亞視新聞部副總裁，其後被捲入亞視管理層裁減新聞編制，干涉新聞自由等事件，並往往作為捍衛新聞專業的角色出現在相關報導中，如 2009 年他帶領的亞視新聞改革及製作播出六四專題報導等。⁶ 而伍晃榮則是比較獨特的個案：身為體育記者，他自創的輕鬆幽默的主播風格有別於主流傳統新聞範式，在報導中使用過的一些名句，如「波係圓嘅」（即球是圓的，喻意球賽變幻莫測，結果難料）更成為社會上流行的「口頭禪」。⁷

另外，被提名六次或以上的香港新聞工作者還包括《信報》創辦人林行止、華語媒體著名戰地女記者張翠容、現任香港無線電視記者方東昇以及前無線電視首席記者兼主播，現已離開新聞界的方健儀。幾位被提名較多的香港本土理想記者在年齡和專業經歷上都有較大差別。梁家榮及程翔是極為資深的新聞工作者，伍晃榮更已在 2008 年逝世，而方健儀和方東昇則是 30 多歲的年輕一代。

在這些香港本地的理想記者中，有些並沒有顯著成就。不過，就像在理論部份所提到的，作為角色範例的人選並不一定是卓有建樹的成功

者，只要他／她在某些方面符合個體對某種理想特質的想像，就有可能成為他人榜樣（Gibson, 2003），譬如方健儀和方東昇也許未曾獲得整個新聞界以至社會認可為有卓越成就的記者，但卻有可能成為一些年輕記者的心中榜樣。⁸

同樣位居第五的是提出四不原則（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民國著名報人張季鸞。張季鸞雖為中國傳統知識份子，但其新聞理念卻非常現代，堅持將《大公報》辦成一份獨立客觀的「民間報紙」，而其提倡的四不原則也是早期中國報人中最接近西方專業主義客觀、中立的表述（蔡曉濱，2011；賴光臨，1978）。

而被提名六次或以上的還有原《大公報》記者，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早期的《人民日報》社長范長江和原《天地新聞》創辦者，後在香港創辦《百姓》雜誌的陸鏗。雖然陸鏗曾在香港辦雜誌，但他的記者生涯始於中國內地，與中國大陸有複雜深刻的聯繫，因此在編碼時我們將他列入來自中國大陸的理想記者。2008年陸鏗逝世後，《亞洲週刊》總編輯邱立本曾為他寫過一篇特寫，回顧他「既坐過國民黨的牢，也坐過共產黨的牢」，是個為新聞「對權力說真話」的人（邱立本，2008）。

除了以上幾位，在兩次調查中曾被香港記者提名的中國大陸記者還包括報告文學作品《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錢剛，《財經》雜誌創辦主編，曾被美國《時代》周刊稱為「中國最危險的女人」（Ramzy, 2009）的胡舒立，前中央電視台記者和主持人，在溫州動車事件中批評鐵道部的白岩松等。從他們身上，我們既可看到中國傳統知識份子憂國憂民的傳統，也可看到與西方專業主義重合的部份，尤其是對權力的監察與批判。在被提名的中國記者中基本上沒有來自黨國新聞範式的人，可見被香港新聞工作者肯定和認同的中國記者大多以與權利對抗、推動社會改革而著名。

表二和以上段落的簡介，主要是提供背景資料和指出該些理想記者最有可能因甚麼事件或成就而得到認同。但一位新聞工作者在提名一位理想記者時，他很可能會對該理想記者有更複雜、深入甚至獨特的理解，不過本文的目標不在研究這種意義的複雜和獨特性。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檢視在被訪者獨特個人意義建構外，理想記者本身以及不同類別的理想記者會否整體上跟新聞工作者的專業和政治理念有所關聯。

所以，我們對被提及的理想記者進行編碼和統計。表三展示了香港新聞工作者心目中理想記者的一些基本特徵。理想記者當中以男性（83.0%）占絕大多數，但兩個年份相比之下，2011 年有更多被訪者提名女性為理想記者，兩個年份間的差異（12.8% 的提名為女性以及 21.5% 的提名為女性）達統計顯著程度。

以出生年代劃分，被提名的理想記者近半數（47.3%）出生於 1931 至 1960 年間，也就是活躍於約 60 至 90 年代。可以預期，隨著時間轉移，被提名的理想記者出生年代也會向後移動。2006 年時，19.3% 的理想記者提名屬於 1960 年或以後出生的新聞工作者，到了 2011 年，相應比例則升至 31.7%。這轉變亦達統計顯著水平。

而媒體類型與年份（2006，2011）沒有相關性。此外，如以上提及，在 2011 年的調查中，來自西方的理想記者顯著下降（2006 年有 40.8%，而 2011 年下降到 28.2%），而香港本地和中國大陸的理想記者則在 2011 年有所增加。

表三：香港新聞工作者心中的理想記者概貌

	2006	2011	合計
性別			
男	87.2%	78.5%	83.0%
女	12.8%	21.5%	17.0%
$\chi^2 = 5.56^*$	N = 218	N = 205	N = 423
出生年代			
1930 及以前	31.2%	23.4%	27.4%
1931 至 1960	49.5%	44.9%	47.3%
1960 及以後	19.3%	31.7%	25.3%
$\chi^2 = 9.28^*$	N = 218	N = 205	N = 423
國家／地區			
香港	45.9%	52.7%	49.2%
中國	13.3%	19.0%	16.1%
西方／其他	40.8%	28.3%	34.8%
$\chi^2 = 7.92^*$	N = 218	N = 205	N = 423
媒體類型			
印刷媒體	53.2%	49.3%	51.3%
廣播媒體	46.8%	50.7%	48.7%
$\chi^2 = 0.66$	N = 218	N = 205	N = 423

註：數字為每欄的百分比。卡方值 (χ^2) 得自將該人口特徵變項和年份 (即 2006 或 2011) 作交叉分析。* $p < .05$ 。

二、「心懷理想」的香港記者

既然只有約 20% 的香港新聞工作者有說出心中的理想記者，那麼這些「心懷理想」的新聞工作者和沒有提名理想記者的從業員在個人特徵和專業理念上有沒有差異？這是研究問題二及假設一至四所關注的面

向。

我們首先分析記者的個人特徵和他們有沒有提名理想記者間的關係。表四歸納了相關分析的主要結果。從表中可見，男女新聞工作者有提及理想記者的比例不一。兩年合計的話，23.8% 的男新聞工作者有提名心中的理想記者，但只有 20.1% 的女新聞工作者有提名理想記者。但若把兩年分開，男女新聞工作者之間的差異只在 2006 年存在。

表四：有提名心目中理想記者的被訪者特徵

	2006		2011		總和	
	有提名	無提名	有提名	無提名	有提名	無提名
性別						
男	123(24.8%)	373(75.2%)	97(22.6%)	333(77.4%)	220(23.8%)	706(76.2%)
女	85(18.5%)	375(81.5%)	99(21.8%)	356(78.2%)	184(20.1%)	731(79.9%)
	$\chi^2(1, 956) = 5.60^{**}$		$\chi^2(1, 885) = 0.08$		$\chi^2(1, 1841) = 3.58^*$	
教育程度						
大學或以上	169(23.8%)	540(76.2%)	187(24.7%)	569(75.3%)	356(24.3%)	1109(75.7%)
沒有大學學歷	48(17.1%)	232(82.9%)	16(10.1%)	143(89.9%)	64(14.6%)	375(85.4%)
	$\chi^2(1, 989) = 5.25^*$		$\chi^2(1, 915) = 16.38^{***}$		$\chi^2(1, 1904) = 18.57^{***}$	
大學所修專業						
新聞傳播	96(25.8%)	276(74.2%)	99(22.8%)	335(77.2%)	195(24.2%)	611(75.8%)
非新聞傳播	72(21.9%)	257(78.1%)	81(26.7%)	222(73.3%)	153(24.2%)	479(75.8%)
	$\chi^2(1, 701) = 1.47$		$\chi^2(1, 737) = 1.49$		$\chi^2(1, 1438) = 0.00$	
年齡						
29 或以下	99(24.3%)	308(75.7%)	101(24.8%)	307(75.2%)	200(24.5%)	615(75.5%)
30 至 44	88(19.9%)	354(80.1%)	71(18.5%)	313(81.5%)	159(19.2%)	667(80.8%)
45 或以上	31(22.1%)	109(77.9%)	32(25.6%)	93(74.4%)	63(23.8%)	202(76.2%)
	$\chi^2(2, 989) = 2.40$		$\chi^2(2, 917) = 5.43$		$\chi^2(2, 1906) = 7.14^*$	
收入 (港幣/月)						
20,000 或以下	131(23.1%)	437(46.9%)	111(23.2%)	367(76.8%)	242(23.1%)	804(76.9%)
20,001 至 40,000	55(19.4%)	229(80.6%)	61(21.6%)	222(78.4%)	116(20.5%)	451(79.5%)
40,001 或以上	25(22.5%)	86(77.5%)	28(22.6%)	96(77.4%)	53(22.6%)	182(77.4%)
	$\chi^2(2, 963) = 1.54$		$\chi^2(2, 885) = 0.28$		$\chi^2(2, 1848) = 1.54$	
媒體類型						
印刷媒體	138(21.6%)	501(78.4%)	120(21.1%)	450(78.9%)	258(21.3%)	951(78.7%)
廣播電視	79(21.9%)	282(78.1%)	80(24.0%)	253(76%)	159(22.9%)	535(77.1%)
	$\chi^2(1, 1000) = 0.01$		$\chi^2(1, 903) = 1.08$		$\chi^2(1, 1903) = 0.64$	

註：數字為屬於某一範疇的被訪者中有提名心目中理想記者的人數及百分比。卡方值 (χ^2) 得自將人口特徵變項和有沒有提名心目中理想記者作交叉分析。有效樣本數因個別變項的缺失值數量不一而有所不同。* $p < .05$; ** $p < .01$; *** $p < .001$ 。

記者的教育程度和他們有沒有提名理想記者也有統計顯著關係。在受過大學教育的被訪者中，有 24.3% 的人提名了心目中的理想記者，比例顯著高於沒有大學學歷的受訪者，也就是說受過大學教育的比沒有大學學歷的被訪者更傾向提名理想記者。這現象在 2006 和 2011 兩年的調查研究中均有出現，可能是因為不少新聞工作者正是通過大學教育認識到一些過往或當代的新聞行業典範。

不過，在有接受過大學教育的新聞工作者當中，主修新聞傳播與否跟有沒有提名理想記者並沒有顯著關係。這指向的是大學生對新聞行業典範的認知可能來自大學整體的教學環境和大學生間關注社會事務的氣氛，而不一定是專業的新聞教育。

至於年齡，我們將被訪者按調查時的年齡分為三個組別：34 歲以下的青年記者、35 至 44 歲的中年記者、45 歲以上的資深記者。表四顯示，中年組別提名理想記者的比例少於其他兩個組別。三個年齡組別間的差異達至統計顯著水平，不過實際差異並不算很大。另外，個人收入和媒體類型兩個變項均和有沒有提名理想記者這變項沒有顯著關係。總的來說，提名了理想記者的新聞從業員相對於沒有提名的被訪者而言，較可能是男性、教育水平較高、較可能是年青或最資深的記者，中年記者較少。

表五總括了關於三個假設的統計分析。首先，有提及理想記者的新聞工作者在四個新聞專業功能重要性指標上都比沒有提及理想記者的新聞工作者有稍高的平均值，其中達至了統計顯著性的是新聞的信息發佈功能 ($t = 1.98, p < .05$) 和社會倡導功能 ($t = 2.25, p < .05$)，所以假設一得到了部分支持。

假設二則得到更全面支持。如表五所示，提名了理想記者的新聞工作者比沒有提名理想記者的新聞工作者更認同媒體的社會影響力。無論

是對政治人物、市民或政府，提名了理想記者的新聞工作者在相關指標上均有較高平均值（ t 值分別為 3.68、2.01 和 2.16， p 值均小於 .05）。另外，假設三也得到了部分支持。提名了理想記者的香港新聞工作者的確更傾向支持民主化（ $t = 1.98$ ， $p < .05$ ），但在「平反六四」一項差別沒有達到統計顯著水平。

表五：提名與未提名理想記者的被訪者在專業理念、媒界影響力認知和政治態度上的異同

	有提名者		未有提名者		N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新聞專業功能重要性					
信息發佈	4.39	0.57	4.32	0.61	1897
	$t(1895) = 1.98^*$ ，95% CI [0.006, 0.13]				
解釋	3.96	0.69	3.94	0.71	1881
	$t(1899) = .68$ ，95% CI [-0.05, 0.10]				
社會倡導	3.72	0.73	3.63	0.74	1843
	$t(1880) = 2.25^*$ ，95% CI [0.01, 0.17]				
反對	3.79	0.92	3.76	0.86	1882
	$t(964) = .60$ ，95% CI [-0.07, 0.12]				
媒體的社會影響力					
對政治人物	3.88	0.83	3.63	0.88	959
	$t(957) = 3.68^{***}$ ，95% CI [0.12, 0.39]				
對市民	3.88	0.84	3.76	0.75	966
	$t(964) = 2.01^*$ ，95% CI [0.003, 0.24]				
對政府	3.51	0.96	3.36	0.89	955
	$t(953) = 2.16^*$ ，95% CI [0.01, 0.29]				
政治態度（自由主義傾向）					
對香港民主化態度	7.45	2.06	7.14	1.99	943
	$t(941) = 1.98^*$ ，95% CI [0.002, 0.62]				
對平反六四的態度	7.34	2.54	7.16	2.40	839
	$t(837) = .90$ ，95% CI [-0.22, 0.59]				

註：我們以獨立樣本 t 檢定來測試兩個組別的平均數之間的差異。

* $p < .05$ ；** $p < .01$ ；*** $p < .001$

三、誰提名不同類型的理想記者

上一節分析重點是有提名和沒有提名理想記者的被訪者差異，而以下這部份的分析將集中在提名了理想記者的被訪者身上。

職業社會學不少有關角色模範的實證研究都指出，人們往往與他們的角色模範有不少相似地方，所以我們預期提名者和他們提名的理想記者可能在一些基本個人特徵上也有共通點，這是研究問題三的關注點。

為了回答該研究問題，我們比較了角色模範和他們的提名者間的一些基本特質，包括性別、年齡段，和工作的媒體性質。教育程度等其他個人特徵則較難查核，所以未被包括在分析中。

表六總結了分析結果，而這些結果並不令人感到意外：不少人都傾向提名與自己有共同點的理想記者。具體而言，在性別方面，在提名了女性理想記者的受訪者中，有 61.4% 是女性，而在提名了男性理想記者的受訪者中，則有 57.8% 為男性。換句話說，不同性別的被訪者在提名理想記者時傾向選擇跟自己同一性別的模範。

表六：理想記者與其提名者的對應關係

提名者特徵	理想記者特徵		
	男性	女性	
性別			
男性	57.8%	38.6%	
女性	42.2%	61.4%	
$\chi^2 = 8.61^{**}$	N = 334	N = 70	
	生於1930及以前	生於 1931 至 1960	生於1960及以後
年齡			
29 或以下	31.0%	44.5%	70.8%
30 至 44	42.2%	41.5%	25.5%
45 或以上	26.7%	14.0%	3.8%
$\chi^2 = 44.48^{***}$	N = 116	N = 200	N = 106
	在平面媒體工作	在廣電媒體工作	
媒體類型			
印刷媒體	77.0%	44.2%	
廣播電視	23.0%	55.8%	
$\chi^2 = 47.74^{***}$	N = 217	N = 206	

註：數字為在提名了某一個組別的理想記者的新聞工作者之中，有多少百分比具備某個個人特徵。個別分析的總有效樣本數因個人特徵變項上有不同數量的缺失值而有所不同。卡方值 (χ^2) 得自將提名者人口特徵變項和理想記者的特徵作交叉分析。

* $p < .05$; ** $p < .01$; *** $p < .001$ 。

值得指出的是，若以行列的百分比來顯示結果，我們會發現，在有提名理想記者的男性新聞工作者中，87.7% 提名了男性理想記者，而在有提名理想記者的女性新聞工作者中亦有 76.6% 提名了男性理想記者。亦即是說，由於傳統上新聞業由男性主導，被提名的理想記者中男性亦佔大多數，所以無論是男性或女性新聞工作者大都會提名男性為理

想記者，只是在相較之下，男性被訪者提名男性理想記者的比例要更高。

在年代方面，提名了相對年輕的（即 1960 年後出生的）理想記者的受訪者中，有 70.8% 是 29 歲或以下的年輕記者。相比之下，提名了在 1931 至 1960 年出生的理想記者的受訪者中只有 44.5% 屬 29 歲或以下的年輕記者，而提名了在 1930 年或以前出生的理想記者的受訪者中，更只有不足三分之一為年輕記者。

在媒體類型方面，提名了來自報業的理想記者的受訪者中有 77.0% 自己本身也在印刷媒體工作，而在提名了來自廣播媒體的理想記者的受訪者中則有 55.8% 自己也在廣播媒體工作，亦即新聞工作者在選擇角色模範時也傾向選擇在同類型媒體工作的同業。總而言之，表六顯示提名者與他們心目中的理想記者之間在幾個基本人口變項上均有對應關係。

最後，研究問題四關心的是提名了香港、中國大陸或是西方記者為角色模範的新聞工作者在專業理念和政治態度等變項上有沒有差異，表七總結了相關的分析。

表七：不同社會傳統的理想記者與他們的提名者

	香港(1)		中國(2)		西方／其他(3)		N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新聞專業角色評估							
信息發佈	4.34	0.58	4.44	0.67	4.44	0.50	419
	$F(2, 416) = 1.82, 95\% \text{ CI } [4.33, 4.44]$						
解釋	3.93	0.74	4.07	0.63	3.95	0.64	414
	$F(2, 411) = 1.02, 95\% \text{ CI } [3.90, 4.03]$						
社會倡導	3.69	0.72	3.93	0.70	3.67	0.74	414
	$F(2, 411) = 3.12^*, 95\% \text{ CI } [3.65, 3.79]$						
	LSD 事後檢定：(1,2)*；(2,3)*						
反對	3.75	0.88	3.88	1.00	3.80	0.95	413
	$F(2, 410) = .55, 95\% \text{ CI } [3.70, 3.88]$						
媒體的社會影響							
對政治人物	3.86	0.83	3.84	0.88	3.94	0.81	203
	$F(2, 200) = .25, 95\% \text{ CI } [3.77, 4.00]$						
對市民	3.81	0.82	3.91	0.73	3.88	0.92	205
	$F(2, 202) = .02, 95\% \text{ CI } [3.77, 4.00]$						
對政府	3.52	0.94	3.63	0.91	3.43	1.02	204
	$F(2, 200) = .45, 95\% \text{ CI } [3.38, 3.64]$						
政治態度（自由主義傾向）							
對香港民主化態度	7.35	2.14	7.82	2.11	7.45	1.90	203
	$F(2, 200) = .64, 95\% \text{ CI } [7.17, 7.74]$						
對平反六四的態度	7.10	2.47	7.87	2.96	7.52	2.39	180
	$F(2, 177)=1.09, 95\% \text{ CI } [6.97, 7.72]$						

註：數字為平均數。我們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測試三個組別的平均數之間的差異，對有統計顯著性的變項（對媒體的社會倡導功能的重視程度），我們進行了 LSD 事後檢定。

* $p < .05$ ；** $p < .01$ ；*** $p < .001$ 。

整體而言，提名了源自不同地方理想記者的新聞工作者在幾乎所有變項上都沒有顯著差異，三個組別的新聞工作者只在對新聞的倡導功能重視程度上有差異【 $F(2, 411) = 3.12, p < .05$ 】。我們對三個組別在這個變項的差異進行了 LSD 事後多重比較，結果顯示，提名了中國大陸理想記者的一組與其他兩組分別有顯著不同，而提名了香港和西方理想記者的兩組則沒有顯著區別。也就是說，提名了來自中國大陸的記者為角色模範的香港新聞工作者比另外兩個組別更重視新聞的倡導功能。跟這點吻合的是，提名了來自中國大陸的記者作為角色模範的香港新聞工作者在政治態度變項上亦得到最高的平均值，亦即他們傾向自由民主的理念。不過，不同組別間在政治態度上的差異未達統計顯著水平。

陸、總結與討論

過去不少職業社會學研究發現，人們根據自己的特點和需要建構理想的專業角色形象，並將其投射到專業群體中的某個具體個人身上，使之成為自己的角色模範，藉此評估、認識自己，並通過仿效來加強自己與模範的相似度，以使得自己更接近理想中的自我（Gibson, 2004）。

本文借鑒了角色模範這個概念，將其應用到新聞工作者身上。我們的經驗研究以香港記者為案例，具體方法是在調查研究中詢問新聞工作者心中有沒有理想記者。總的來說，我們發現香港新聞工作者心目中的理想記者在時空上有很大差異：在兩次調查中被提名的 171 位理想記者，包括清末思想家兼報人梁啟超，二十世紀中的義大利女記者法拉奇，以及今天年輕一代的香港記者方東昇。

被提名的理想記者之時空差異部份是因為被同行認可的記者往往不只是在行業內被推崇，很多記者本身是社會名人，廣為公眾認知，有些

更名載史冊。所以，新聞工作者可以從多個管道接觸到當代以及歷史上的著名記者。同時，新聞工作者也可以在自己的日常工作環境中以上司或前輩為目標，所以被提及的理想記者也不一定是所謂名記者。另外，在香港獨特歷史和社會背景下，本土新聞業向來都同時受著西方以及中國大陸的新聞傳統影響，這也使得香港新聞工作者心中的理想記者很多時候並非來自本地，如表三就顯示了以本地新聞工作者為理想記者的被訪者，佔有提名理想記者的被訪者不足一半。

本研究發現，不是很多香港新聞工作者有提出心目中的理想記者，在兩次調查中有提名心目中理想記者的被訪者比例均不足四分之一。當然，我們不知道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新聞工作者會否有更大比例具有心目中的理想記者，但是這兩次調查得出的百分比本身無可否認是偏低。

這個現象的出現有幾種可能的解讀：首先，可能跟新聞的職業性質有關。在崇尚自主和獨立的專業文化中，從業者比較不易將他人視為自己摹仿和學習的典範。同時，新聞的專業理想往往崇高而抽象，從業者也不一定容易為自己的理想在不完美的現實中找到載體，不過這個推斷需要將新聞與其它專業進行比較才能定論。

第二種可能是與香港本地記者的專業意識有關，如我們的分析發現，對角色模範的認同的確與記者的專業意識（包括對新聞角色的認知和新聞影響力的判斷）相關；換句話說，較低的提名率也可能反映的是不少香港記者專業意識不強。對有些記者來說，新聞是一份工作多於是專業理想，因此也就不會尋找及認同一個現實榜樣來與理想標準對應。

第三種可能與我們的概念化方式有關：雖然我們強調「理想記者」一詞在香港的日常語境中較其他字眼更適合代表「角色模範」這學術概念，但相比之下，「理想記者」的要求似乎較高，因為它代表著被提名的人接近提名者想像中的完美典範，但很多人平時在生活中的「角色模

範」並不一定被認為達至或接近完美。譬如公司裡的初級職員可能會以上司為目標和學習對象，在這情況下該上司已可算是該初級職員的角色模範，但這並不等於該初級職員會覺得自己的上司很接近完美。同樣道理，新聞工作者平時也許在自己身邊有學習對象，但他不一定覺得那學習對象是「理想記者」。換句話說，在心中有角色模範的香港新聞工作者實際上可能比本研究得出的比例高。

不過，「理想記者」和「角色模範」兩詞的意義雖有差異，卻不影響本研究的所有分析。儘管不是所有角色模範都是理想記者，但理想記者卻應有角色模範的意味。所以，「理想記者」仍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角色模範」。

事實上，我們根據角色模範這概念而預期的結果有不少確有出現，例如我們發現提名者和被提名的理想記者之間往往有人口特徵上的共通點，這跟角色模範研究中的發現相吻合（Bakken, 2005; Karunanayake & Nauta, 2004; McLean, 2004a, 2004b; May, 2009）。更重要的是，提名了理想記者的人與沒有提名的在一些態度和理念上有顯著差異。有提名理想記者的新聞工作者的政治取向更傾向民主自由的理念，也更相信新聞對社會大眾和政府具有影響力。這是因為記者心目中有角色模範時，他們對新聞專業有較為積極和清晰的想像。同時，在一個社會之中，角色模範所承載的主要是該社會新聞專業中的主流價值觀念。

在新聞專業功能認知上，研究假設也得到部分支持。有提名理想記者的被訪者比沒有提名的更重視新聞的信息發佈和倡導功能，而在新聞的解釋和對抗權威的功能上則沒有顯著差異。新聞的信息發佈功能是西方自由主義新聞觀的核心理念，與客觀性專業意識形態密切相關，如果說角色模範是主流專業理念的載體，就不難理解心目中有角色模範的新聞工作者更重視這一功能。

至於新聞的社會倡導功能，我們認為可能的解釋是，人們往往因某些記者對社會變革所發揮的作用而記住他們，如美國記者 Walter Cronkite 或 Peter Arnett 被認為對越戰的結束產生了重大影響。而梁啟超、張季鸞等除了是報人外，也是近代中國社會啓蒙的推動者。也就是說，在記者這個群體中，社會參與度高的比較容易成就專業名望，所以，理想記者或角色模範所承載的對新聞的社會功能的理念，也較傾向是跟推動社會改革相關的倡導功能。

有趣的是，當我們考察提名了來自不同地方的新聞從業員為理想記者的被訪者間有甚麼差異時，主要差異在於提名了來自大陸新聞從業員為理想記者的被訪者更重視新聞的倡導功能。這可能是在中國大陸新聞受到國家嚴密控制情境下，推動社會改革的記者往往要承受很大的壓力，甚至有人身安全的顧慮，所以這些記者也特別受人矚目及景仰。結果相比之下，大陸的名記者平均而言更能代表新聞的倡導功能。

不過，表七所展示的發現亦代表著，在香港新聞工作者的心目中，來自大陸、香港和西方的理想記者承載的理念其實差異不大，這符合角色模範研究中強調的觀察者主體選擇和建構的觀點。亦即是說，縱使在客觀上，西方、香港和中國大陸的新聞傳統可能有差異，但當香港新聞工作者選擇某些來自中國或西方的記者為角色模範時，他們投射到這些模範身上的形象大同小異，而該模範形象的基礎主要仍是跟在香港佔主導地位的專業主義理念密切相關。

也可以說，縱使中國大陸和一些西方國家可能存在著不同類型的記者，但當香港新聞工作者選擇角色模範時，他們會傾向選擇那些符合香港新聞專業理念的非本地記者為學習對象。從較廣義的理論角度來看，這發現指向的是一個社會對另一個社會的新聞理念和實踐往往會有選擇性的接收。而理想記者或角色模範在這選擇性接收過程中很可能扮演著

重要的角色，因為他們可以把一個社會的新聞界中存在的某些專業理念和實踐具體化。

總括而言，本文探討的議題是，一個社會的新聞工作者通常都在專業理念上有廣泛共識，亦形成一個詮釋共同體，對新聞現象以至社會周遭的事物有共同理解和態度。但新聞工作者到底可以通過甚麼方法來把抽象的觀念和意理連繫至具體的新聞環境中和實務操作上呢？本文的啟示是，一個社會的新聞工作者對自己專業的了解是可以通過把個別記者視為模範而具體化。當一位新聞工作者在心中選擇了一個角色模範後，這角色模範亦會對該新聞工作者的行為和態度產生影響。

如文章開首所指出，過往新聞學中較少有研究分析受認同的記者對同業的影響（少數研究文章如 Calson, 2007; Greer, 2008）。而本文顯示，這實是值得更多關注的題目。本研究中的不少發現跟職業社會學研究發現吻合，這一方面表示本研究的發現未必有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但另一方面，檢驗職業社會學的基本研究發現能否適用於新聞行業是必要的，而本研究的結果應為未來有關新聞行業中角色模範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礎。

誠然，而本研究的分析建基在一些概念性假設上。如我們認為一個社會中新聞工作者心中的角色模範應承載著該社會的主流專業理念，研究結果顯示這概念性假設在整體而言成立（否則由此導引出的研究假設不會被數據支持），但這概念性假設其實只指出一個整體傾向。在社會中，當然並非每位新聞工作者心目中的角色模範都跟主流專業理念有關。如在本研究中，香港資深體育主播伍晃榮被多位被訪者視為理想記者，但我們很難把伍晃榮跟媒體的倡導功能、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或媒體對政府的影響拉上關係。

事實上，透過量化研究方式，我們在為理想記者分類時亦會無可避

免地將背景和其他特徵頗不一樣的理想記者組合起來。統計分析顯示的是屬某一類別的理想記者，彼此間有著差異的同時，會否也展示出一些整體傾向。但不能否認，在統計分析得出的整體傾向以外，每位新聞工作者心中的理想記者的意義也可以不一樣，而從意義建構的角度出發，個體新聞從業員如何選擇角色模範、如何建構角色模範對自己的意義，而這些意義又如何影響新聞從業員的行為，是需要通過其他如深度訪談等方法加以處理的議題。未來研究可以嘗試用定性研究方法針對角色模範對新聞工作者的意義作更仔細的探討，也可以在本文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角色模範對新聞工作者實際行為的影響。

註釋

- 1 電視業固然是二十世紀下半葉的產物，報章方面，如《明報》創辦於 1959 年、《東方日報》創辦於 1969 年、《信報》創辦於 1973 年。《蘋果日報》創辦於 1995 年。在二次大戰前創辦而在今天香港仍具影響力的報章，應只有《南華早報》（1903）和《星島日報》（1938）。
- 2 受訪記者來自全香港 23 家主要媒體，包括香港電台、商業電台、新城電台、無線電視、亞洲電視、有線電視、NOW TV、香港寬頻、《明報》、《信報》、《星島日報》、《文匯報》、《大公報》、《蘋果日報》、《商報》、《經濟日報》、《成報》、《東方日報》、《The Standard》、《新報》、《都市日報》、《頭條日報》和《AM730》。
- 3 雖然 Peter Jennings 的國籍是加拿大，但他主要的工作與成就都在美國。
- 4 除 Jennings 之外，表二中有幾位記者在 2006 年及 2011 年的調查中有大幅度的浮動，包括 Dan Rather（2005 年 6 次提名，2011 年 0 次），梁家榮（2006 年 1 次，2011 年 11 次）以及方健儀（2006 年 0 次，2011 年 6 次）。其中 Dan Rather 在 2005 年離開 CBS，因此自 2011 年前幾年他已甚少出現在香港媒體環境中，這有可能是他在 2011 年沒有被提名的原因之一。但值得指出的是，除了以電視新聞工作者的身份出現外，梁家榮和方健儀在調查前半年都沒有以新聞主角身份出現在媒體中。直至 2011 年 9 月 5 日，梁家榮因無法阻止亞洲電視台誤報江澤民死訊而引咎辭職，暗示受到壓力干擾新聞自主，但此事件發生在

- 2011 年記者調查之後。所以，他們兩位在兩個不同年份被多少同行認同，跟調查期間或之前的新聞事件應沒有太大關係。
- 5 江澤民在 2000 年 10 月 27 日於中南海接見當時的特區行政首長董建華，在閉門會議前與董一起會見傳媒。期間有線電視記者質詢中央對董建華連任特首的態度，引起江澤民不滿，當場訓斥香港記者「Too simple, sometimes naïve」，並暗示香港記者要向 Mike Wallace 學習。
 - 6 如註釋四提及，2011 年 9 月 5 日，梁家榮因無法阻止亞洲電視台誤報江澤民死訊而引咎辭職，但事件發生在 2011 年記者調查之後。
 - 7 前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在 2006 年 5 月 27 日在香港電台節目《香港家書》中也引用過「波係圓嘅」這句話。
 - 8 以方健儀為例，她在 2006 年底加入無線電視新聞部，2009 年晉升為首席記者，多次採訪及報導重要新聞事件，包括北京奧運、08 年美國總統大選及 2010 年馬尼拉香港人質事件等。所以，在 2006 年並沒有被提及的她在 2011 年被較多同行認可為理想記者是可以理解的。

參考書目

- 邱立本（2008 年 7 月）。〈他的一生就是獨家新聞〉，《亞洲週刊》，22(26): 60。
- 陸曄、潘忠黨（2002）。〈成名的想像〉，《新聞學研究》，71: 17-59。
- 蔡曉濱（2011）。《中國報人》。臺北：秀威。
- 賴光臨（1978）。《中國新聞傳播史》。臺北：三民。
- Bakken, L. L. (2005). Who are physician-scientists' role models? Gender makes a difference. *Academic Medicine: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s*, 80(5), 502-506.
- Bandura, A. (1977). *Social learning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Basco Jr, W. T., & Reigart, J. R. (2001) When do medical students identify career influencing physician role models? *Academic Medicine*, 76(4), 380-382.
- Berkowitz, D. (2000). Doing double duty: Paradigm repair and the Princess Diana what-a-story. *Journalism*, 1(2), 125-143.
- Byszewski, A., Hendelman, W., McGuinty, C., & Moineau, G. (2012). Wanted: Role models -- medical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professionalism. *BMC Medical Education*, 12, 115.
- Carlson, M. (2007). Making memories matter: Journalistic authority and the memorializing discourse around Mary McGrory and David Brinkley. *Journalism*, 8(2), 165-183.

- Carlson, M. (2011). Rethinking journalistic authority. *Journalism Studies*, 13(4), 1-16.
- Chan, J. M., & Lee, C. C. (1991). *Mass media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The Hong Kong press in China's orbit*. New York, NY: The Guilford Press.
- Chan, J. M., Lee, P. S. N., & Lee, C. C. (1996). *Hong Kong journalists in transition*. Hong Kong, HK: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heung, C., & Yue, X. D. (2003). Identity achievement and idol worship among teenagers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olescence and Youth*, 11(1), 1-26.
- Cross, S., & Markus, H. (1991). Possible selves across the life span. *Human Development*, 34, 230-255.
- Essers, G., Van Weel-Baumgarten, E., & Bolhuis, S. (2012). Mixed messages in learning communication skills? Students comparing role model behaviour in clerkships with formal training. *Medical Teacher*, 34(10), e659-e665.
- Gibson, D. E. (2003). Developing the professional self-concept: Role model construals in early, middle, and late career stages. *Organization Science*, 14(5), 591-610.
- Gibson, D. E. (2004). Role models in career development: New directions for theory and research.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65(1), 134-156.
- Greer, C. (2008). Media literacy and Internet discussion lists: A fantasy theme analysis of online postings following the death of Peter Jennings. *Studies In Media &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8(2), 1-11.
- Hackett, G., Esposito, D., & O'Halloran, M. S. (1989). The relationship of role model influences to the career salience and educational and career plans of college women.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35(2), 164-180.
- Johnson, P. (2005, August 9). The last of the iconic anchors. *USA Today, Life*, p. 01d. Retrieved from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database*.
- Jung, J. (1986). How useful is the concept of role model? A crit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4(1), 525-536.
- Karunanayake, D., & Nauta, M. M. (200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ace and students' identified career role models and perceived role model influence. *The Career Development Quarterly*, 52 (3), 225-234.
- Lau, S. K. (1982).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K: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Lee, F. L. F. (2007). Strategic interaction, cultural co-orientation, and press freedom in Hong Kong.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2), 134-147.
- Lent, R. W., Brown, S. D., & Hackett, G. (2000). Contextual supports and barriers to career choice: A social cogni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47(1), 36-49.
- Lockwood, P., & Kunda, Z. (1997). Superstars and me: Predicting the impact of role models on the self.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3(1), 91-103.
- Ma, J. (1999). *Culture, politics and television in Hong Kong*. New York, NY: Routledge.
- May, R. A. B. (2009). The good and bad of it all: Professional black male basketball

- players as role models for young black male basketball players.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26(3), 443-461.
- McAllister, M., Happell, B., & Bradshaw, J. (2010). Making us what we are: Noteworthy people and achievements in Queensland mental health nurs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Nursing*, 19(4), 250-256.
- McLean, M. (2004a). The choice of role models by students at a culturally diverse South African medical school. *Medical Teacher*, 26(2), 133-141.
- McLean, M. (2004b). Is culture important in the choice of role models? Experiences from a culturally diverse medical school. *Medical Teacher*, 26(2), 142-149.
- McLeod, J. M., & Hawley, S. E. (1964). Professionalization among newsmen.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41(4), 529-577.
- Pan, Z., & Chan, J. M. (2003). Shifting journalistic paradigms: How China's journalists assess "media exemplar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0(6), 649-682.
- Quimby, J. L., & Santis, A. M. (2006). The influence of role models on women's career choices. *The Career Development Quarterly*, 54(4), 297-306.
- Ramzy, A. (2009, November 10). *China's 'most dangerous woman' gets a new forum*. Retrieved from <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1936933,00.html>
- Schudson, M. (1993). *Watergate in American memory*.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So, C. Y., & Chan, J. M. (2007). Professionalism, politics and market force: Survey studies of Hong Kong journalists 1996-2006.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2), 148-158.
- Weaver, D. D. H., & Wilhoit, G. C. (1986).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Weaver, D. D. H., & Wilhoit, G. C. (1996).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in the 1990s: US news people at the end of an era*. New York, NY: Routledge.
- Whitbourne, S. K. (1985). The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life span. In J. E. Birren & K. W. Schaie (Eds.), *Handbook of the psychology of aging* (2nd Ed.) (pp. 594-618). New York, NY: Van Nostrand Reinhold Co.
- Yue, X. D., Cheung, C., & Wong, D. S. W. (2010). From glamour-oriented idolatry to achievement-oriented idolatry: A framing experiment among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and Shenzhen.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1), 1-8.
- Zelizer, B. (1992). *Covering the body*.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Zelizer, B. (1993). 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0(3), 219-237.

附錄：媒體功能轉軸後成分矩陣表

測量變量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質疑並批評工商界的言行	.939	.218	.106	.117
質疑並批評社會團體的言行	.926	.215	.095	.137
質疑並批評政府官員的言行	.905	.252	.125	.110
推動社會改革	.178	.798	.078	.171
成為公眾的喉舌	.160	.773	.147	.089
聲援社會弱勢團體	.198	.764	.072	.171
幫助市民實行輿論監督	.239	.585	.316	.219
依據事實報導最近發生的事件	.102	.112	.875	.155
迅速地為大眾提供新的信息	.086	.132	.815	.096
報導可靠信息以阻止流言的散播	.087	.150	.676	.295
對政府的政策作出解釋	.095	.147	.071	.891
幫助市民了解政府的政策」	.124	.175	.281	.781
對形成中的政策展開討論	.160	.279	.339	.611

註：KMO 值為 .857，球形檢定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足見媒體功能量表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經因素分析後媒體功能量表可萃取出四個因素，共可解釋 73.80% 變異量。

Professional Role Models of Journalists and Their Influence: The Case of Hong Kong

WANG, Bess Y; LEE, Francis L. F.*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role models from career studies, this research determined whether distinctive journalists influence other journalists by embodying professional ideologies. Based on the case of Hong Kong, we examined this topic by using data from surveys of journalists in 2006 and 2011, and found that respondents having professional role models tended to believe that news had strong social influences. The respondents ranked the professional functions of news to be high and liberal in political attitude. We also found that ideal journalists (role models) nominated by Hong Kong journalists were quite similar in terms of the journalistic paradigm and ideologies, despite their originating from varied societies. By contrast, ideal journalists from Mainland China represent the advocating function of journalism. We determined that the concept of the role model is applicable to studying journalists by providing initial evidence of its significance in journalism studie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establish a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tudy on this issue.

Keywords: Hong Kong, journalist survey, professionalism, role model

* WANG, Bess Y, Ph.D. Candidate i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EE, Francis L.F., Associate Professor i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